



日本文学经典 与民族文化研究

叶琳等 著

Literary Canon & National Culture

外国文学经典与民族文化研究丛书

主编 江宁康



 人 民 出 版 社



日本文学经典 与民族文化研究

叶琳等著

责任编辑:李 惠
装帧设计:雅思雅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文学经典与民族文化研究/叶琳 等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3
(外国文学经典与民族文化研究丛书/江宁康主编)

ISBN 978-7-01-014188-6

I. ①日… II. ①叶… III. ①日本文学-文学研究②民族文化-研究-日本 IV. ①I313.06②I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71055 号



日本文学经典与民族文化研究

RI BEN WEN XUE JING DIAN YU MIN ZU WEN HUA YAN JIU

叶琳 等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7

字数:385 千字

ISBN 978-7-01-014188-6 定价:5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总序

哈罗德·布鲁姆在其大作《西方经典》中列出了一千两百多部外国文学经典之作，但他仍以书目中缺少东方文学经典而深感遗憾。我们这套“世界文学经典与民族文化研究系列丛书”虽然也无法尽揽东西方名著于内，但却力图在若干国别文学经典与民族文化认同等方面做出一些深入的研究与论述。我们这套丛书的出版是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内一批学者集体努力和辛勤耕耘的结果，其意图不仅在于把外国文学研究与民族文化研究相结合而进行一次跨学科的学术探索，而且在于从全球化的视野中对若干国家的文学经典建构进程做一次跨文化的学术研究，进而在国外文学研究和民族文化认同等方面的跨学科和跨文化研究中取得观念的突破和方法的创新。

文学创作是通过文字书写的方式来塑造各种艺术形象，从中表达人类的思想感情，再现历史的风霜雪月，传承民族的精神血脉。从各民族的文学史和文化史的发展历程来看，文学经典历来具有民族书写和文化认同的重大意义。例如，中国的《诗经》和《楚辞》等先秦典籍既是中华民族的文学经典之作，也是中国人文化认同的标志性创作，其文化影响力和文学传承性至今不衰。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和古印度的《摩珂婆罗多》等巨著既是民族文学的开创之作，也是民族历史的辉煌叙述。可以说，一个民族的文学经典常常代表了该民族的独特文化传统，保存了该民族的持久集体记忆，展示了该民族的审美创造成就，传承了该民族的价值观念体系。同时，各民族的文学创作都会反映出人类的共同理想追求，表现出人类共同的思想情感，从而在世界各民族之间架设起一座沟通心灵的桥梁。在全球化时代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日趋频繁之际，各民族的文学经典作品已经成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象征，并且在各国的文化交往中成为各自文化实力的生动展示。从文学经典与民族文化的相互关系来看，文学经典作品对于维护



一个民族的身份认同、增强民族的文化活力和建构民族的文化传统等方面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所以，文学创作和民族文化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血脉联系，正如钱穆先生在《民族与文化》一书中指出的：“民族创造了文化，但民族亦由文化融成。”这种“互相建构”的机制就是霍米·巴巴在其论著《民族与叙述》中一再强调的民族身份的文化建构性和文学叙述性，而文学叙述，特别是经典作家作品中传达的民族叙述与本土风情对于民族身份建构和民族国家认同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在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学地图上，西方国家的文学经典在域外传播的时空范围随着其海外资本的扩张不断地延伸着，东方国家的文学经典也随着经济的崛起而不断地进入西方国家的文化时空。各国、各民族和各地区的文化交流与人员往来日益频繁，因此各民族文学经典对于文化认同和文化融合更加具有指标性的意义。在世界文化的舞台上，各民族文学经典作品正在各种新媒体如影视与网络等媒介上被不断地再现、改编和传播，世界文学地图也变得更加斑斓交错、壮景迭现。高雅与通俗、语言与图像、个人与民族、东方与西方——这些不同领域里的各种文化差异正在被新的文学创造所消解，而全球性想象和文学书写也在文化全球化与文化民族化的双向进程中不断得到更新和发展。文学经典与民族文化正在比肩前行、交融壮大，而全人类的创造性艺术才能和超民族文化融合也在这一进程中不断地得到生动展示。本套丛书既是见证此进程的一幅集锦地图，也是跨学科、跨文化研究的一项重要工程，其学术创新性和文化影响力必将在日后的岁月中不断地彰显出来。

江宁康

2014年1月

前言

文化是伴随人类社会的产生而出现的特有的现象。它是人们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从事社会实践的产物。文化是由人创造出来的，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文学是通过语言文字以其独特的形式反映人类客观社会、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艺术。作为文化的一部分，文学作品（小说）自然会体现一定时代外在的文化现象和内在的文化实质。因此，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是文化的载体。如果不了解一个国度的文化，不清楚一部文学作品的文化背景，就无从真正把握和理解该文学作品的深意。同样，对日本文学作品进行解读之前，需要对日本文化的整体性有深入的了解。而日本文化的特征恰恰又突出反映在了日本文学的主要特点上。

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国。日本人自古以来就是以村落为单位，齐心协力以种植水稻为生。长期以来的共同劳作、共同发展、共同生存使日本人形成了一种共同体或群体意识，人与人之间重视的是“水浓于血”的关系。在群体结构中，人们将集团的利益和意志放在首位，将个人的利益和意志放置一边，或深藏不露，或尽量压抑，彼此相互依赖，相互协同，同甘共苦。同样的风俗习惯、审美意识、道德标准和行为方式导致整个日本形成了一种群体性的、均一化的文化特征。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日本人很难体现自己的鲜明个性和主张。因此，在日本文学中表现的突出特征之一就是非个性化占主导。正如日本国文学家伊藤正雄（1902—1978）所指出的那样：“自歌论《古今和歌集》问世以来，诗情、题材和用语都几乎没有明显的发展，直至1000年之久，（作家们）不知疲倦地反复创作千篇一律的作品。”^①

^① [日]伊藤正雄、足立卷一：《日本文学史要说》，社会思想社1984年版，第311页。



再纵观日本历史,可以发现由日本本土人、大陆渡来人经归化后,日本几乎是一个单一性民族(大和民族)的国家,没有受到过其他国家和外来民族的侵略,作为国家与民族统一象征的天皇自古至今都是世袭,由同一血统的皇族人来继承皇位,历史朝代更迭也不频繁。尽管皇族内部也曾发生过无数次争夺皇权的斗争,但是杀父弑子之类的事件极为罕见。因此,在日本文学中找不到,也看不见关于描写民族仇、阶级恨、国家分裂、内忧外患、战争连绵不断的主题作品,即“激烈的怒吼……雄壮而崇高的风物和人事,不从所见。”^①日本现代著名文学评论家加藤周一(1919—2008)也曾指出:日本“对于社会风俗的批判,在和歌中不曾所见,在假名书写的物语中也极其少有”,“谁也不会想象唐朝诗人那样吟咏战争的悲哀和贫穷的痛苦,吟咏对于腐败政治的愤怒。”^②即使有,也可谓凤毛麟角。较为稳定的政治、平和的社会发展使得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更关心与自己密切相关的自然环境。咏叹自然、纤细敏感的心理感受成了日本民族的一大特性。因此,这样的文化土壤造就了日本文学自诞生起就显得比任何一个国家格外亲近、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善于挖掘人物内心的细腻感受,远离政治社会,具有较浓郁的“超政治性”色彩。

日本著名中国文学研究学者铃木修次(1923—1989)先生曾在其专著《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1971)里这样说过:“日本人一直是生活在过于超政治性的土壤之中。”对日本人来说,“文学本来就与政治无关。对文学而言,政治是无缘的存在。”^③在日本,文学家认为把文学同社会政治联系起来并大谈其思想性是极其庸俗的。伊藤正雄在论及日本文学的特征时也指出过:“在日本,文学家不是政治家。同样,政治家也非文学家。文学家不关心政治,政治家对文学缺乏一定的造诣”。“文学家向来把政治家视为俗物,政治家把文学家看作无用之物”^④。因此,“主情”或“重抒情”是日本文学的一大特色,这在世界文学中也是极为罕见的。我们不仅能从日本古代具有代表性的文学

① 《万有大事典》第一卷,小学馆1977年版,第675页。

② 转引自李芒:《采玉集》,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53页。

③ [日]铃木修次:《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东京书籍株式会社1991年版,第52页。

④ [日]伊藤正雄、足立卷一:《日本文学史要说》,社会思想社1984年版,第314页。

作品里如《万叶集》《源氏物语》《枕草子》《徒然草》《古今和歌集》等领略一斑，而且也能从日本近现代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文学作品里如《灰色的月亮》（志贺直哉）、《细雪》（谷崎润一郎）、《雪国》（川端康成）、《挪威的森林》（村上春树）等了解一些。

可以说，这样的文化性格使代表日本纯文学的“私小说”在日本文学史上独具特色。所谓“私小说”就是作家将写作的重心放在自己切身的体验或自己身边出现的人或琐碎的事情上，客观描述自己的个人感受，注重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纯文学追求为艺术而艺术，努力将政治色彩从文学中剔除掉。

另外，由于日本人长期生活在小巧自然的环境中，养成了一种重纤小、简洁，轻烦琐的民族性格，从而使日本文学家在形式上喜欢创作洗练的文学作品，古代文坛以“和歌”“俳句”为优，近现代文坛则多以短篇小说胜出。即使是长篇小说也是多缺乏整体的统一性和严密的逻辑性，结构比较松散。有些长篇小说基本上就是短篇的连缀。像川端康成（1899—1972）本人就明确表示过，自己在“二战”期间写就的长篇小说《雪国》就是由一个个短篇组合而成的。另外，被日本近代文坛誉为“短篇小说之神”的大文豪志贺直哉（1883—1971）在他有生之年创作的唯一长篇小说《暗夜行路》也是如此。他们的小说随处均可告一段落，随处也都可以完结。同样，像《源氏物语》这样的浩瀚长卷，尽管不是短篇的连缀，但它的结构也是缺乏统一性，故事情节都是呈并列的直线形展开。它看上去如同画卷一般。正如日本文学评论家吉田精一（1908—1984）先生指出的：“散文物语具有明显的画卷式的性质”，“画卷不宜一次全部看完，而应一部分一部分展开卷起，欣赏其每个局部的美，因为它的中心分散在每个局部，每个场面相互之间的联系未必严密”。^①

日本文化中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整体特征就是兼容并蓄，呈多元性。加藤周一自1955年就提出了“日本文化杂种”理论。古代是中国文化滋养了日本文化的根须，明治维新以后西欧文化又滋润了日本文化的根部。“这一切都早已以一种不可挽回的形式深入到日本人的日常

^① [日]吉田精一：《日本文学的特点》，《日语学习与研究》1985年第2期，第48页。



生活中”^①，这就使日本文化无论怎样想剔除来自外来文化的枝叶都是不可能的，这种烙印永远相随。但有一点需要注意，无论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如何对日本文化加以浇灌，日本人向来不是全盘接受和全盘西化，而是根据日本人长期养成的审美意识，将外来的文化加以日本化，兼收并蓄。正如日本著名学者上山春平所说，“在日本文化的发展中，从层次上看，旧物为深层，新物为表层，旧物不断为新物覆盖而由表层下沉为深层”^②，而且深层的物质又不断生成“新质”的内容。这就说明，日本文化是不断同外来文化相互融合、共生共存的。它不是新的替代旧的，更不是旧的被新的所淘汰，而是“和魂”加“汉风”再加“西风”，像宗教在日本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事例。

日本的宗教主要是神道、佛教和基督教。其中，神道是日本民族最原始的、最基本的自然宗教。它是基于对自然的一种独特的感受，在日本这块土地上自然生成的民族宗教。既没有特定的教祖，也没有传世经典。作为祭祀的神名称繁多，号称“八百万神”，无形无影，却又随处可在。可以说，在日本祭祀各类诸神的神社比比皆是。神教本身从诞生起就是多神教。到了中世纪（12世纪末至17世纪初），以自然本位、现世本位、敬神崇神等根本的本土神道受到了外来儒学、佛教、禅宗的影响，慢慢形成现在“新质”的日本神道。根据日本的《古事记》所载，日本儒学家王仁（生卒年不详）经百济将《论语》和《千字文》等儒家经典最先带到日本，继体天皇在位时（507—531），积极推动儒学思想在日本的传授。圣德太子（673—622）在制定《冠位十二阶》和《十七条宪法》时特别强调“以和为贵”“上下和睦”的儒家道德规范。6世纪佛教经中国、朝鲜半岛传到日本之后，日本民族又开始接受了来世主义的思想，把对来世极乐世界的祈祷转化为对现世安宁世界的祈福。佛、神道的融合在丰富了原始神道教的同时，也使外来佛教趋于日本化。佛教主张游于四方、因果报应、“清静无为”“远离政治”等思想深受日本贵族的欢迎，大大超过了儒家的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到中世纪，由于战乱，政权交替不断，无常思想便

① 转引自卞崇道：《关于岛国日本文化论的思考》，《浙江海洋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第6页。

② 转引自杨薇：《日本文化模式论》，《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第73页。

大行其道，佛教成了日本人心中的精神寄托。此时，具有中国特质、视“生死一如”的禅宗作为佛教的一派，于12世纪传入日本后，立刻受到武士阶层的支持和欢迎。这一切外来文化经过日本人的长期融合后，形成日本的民族性格，构成日本文化的“和魂”。基督教在16世纪传入日本后，虽曾受到过统治阶级的多次阻挠和迫害，但到了19世纪随着西方文明的大量涌入，基督教再次在日本盛传。于是，神道、佛教、基督教至今都存在于日本人的生活中。日本人出生时参拜神社，结婚时举办基督教式婚礼，死后举行佛教仪式。因此，无论是外域的佛教还是基督教，到了日本都没有取代日本本土的神教，而是彼此相容并存，互不排斥。正如日本民族学家冈正雄（1898—1982）所说：“日本民族及其文化的构成不是单一文化、同一体系文化的分化和发展，而是由不同体系多元化的种族和文化混合累积而成的异质异体系构造。”^①

日本这种多元文化的特征在文学上也突出表现为多样化。在古代，平安时代（794—1192）物语文学的“感悟兴叹”、中世时期连歌的“幽玄”、近世时期（1568—1867）俳谐的“风雅”等文学理念一直贯穿整个日本文学，它们彼此并非毫无关联。最初的“感物兴叹”本身的含义是当感情的主体触及客观事物的对象时，会自然产生各种情绪要素的感动。它代表了日本文学的一种精神。在此基础上，“幽玄”把人们对自然、对客观世界的各种情感表达纳入到一种“言之不尽”“深奥莫测”的境界。随之而来的“风雅”又将“感悟兴叹”升华到与自然一体化，远离政治的心境，与神秘主义相同的“幽玄”相融合，成为贯穿整个日本文学艺术与文化的最高审美理念。无论哪一种理念，在日本文学的发展史上都没有消亡，而是呈现一种多维、立体的态势。因此，在日本古代文学表现的手法上，总是带有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合质。

不仅古代文学如此，在日本的近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中，也依旧是呈多元化的表现。无论写作手法如何变化，如何翻新，如何吸收外来文艺创作理念，甚至在后现代的语境下如何解构，几乎都是将日本传

^① 转引自郭海红：《坪井洋文“民俗文化多元论”思想研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第23页。



统文学的根基不断加以丰厚，将日本文学创作主题不断扩大化。尽管在无产阶级文学占领文坛、军国主义统治者把持天下，突出政治和国家政策的时期，日本文学也曾一度出现“一片红”和“一片黑”，但它并没有成为主流文学。特别是“二战”战败以后，在西方的各种文艺理论与思潮不断涌入日本的情况下，日本文坛一方面新的文学流派层出不穷，另一方面很多不属于任何流派、打破原有学科界限的个性作家大量涌现，可谓百花齐放。因此，在日本近现代文学中，占主流的日本文学很难用“××主义的文学取代了××主义的文学”来套用，总是呈现多姿多彩的风貌。

本书主要选取了日本古代和近现代著名作家的代表作品进行解读。其中古代以万叶诗歌、深受中国文学影响的《日本灵异记》、紫式部的《源氏物语》为主，近代以夏目漱石、志贺直哉、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田村俊子等作家的经典文学作品为核心，现代以井上靖、野间宏、安部公房、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等作家的的重要文学作品为蓝本，从语言、社会、历史、文化、美学等视角进行多维剖析和研究。希望能给日本文学爱好者和学界研究者提供一个值得参考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平台。同时，由于水平、资料有限，在论述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敬请各位读者和研究者给予批评指正。

叶琳

于镰仓市雪之下

2013年3月24日

目 录

前 言	1
-----------	---

上 篇 日本古代民族文化与文学经典形成

《万叶集》的万叶假名	9
《日本灵异记》与中国的《冥报记》	32
紫式部的《源氏物语》	54

中 篇 日本近代文学经典与民族文化遗产

田村俊子的《生血》《木乃伊的口红》《女作者》	106
岛崎藤村的《破戒》	158
夏目漱石的《门》和《心》	168
志贺直哉的《暗夜行路》	194
芥川龙之介的《罗生门》	210
谷崎润一郎的《春琴抄》	223

下 篇 日本现代文学经典与民族文化转型

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	253
井伏鱒二的《鲋鱼》和《遥拜队长》	263



野间宏的《脸上的红月亮》	282
大冈升平的《俘虏记》和《野火》	290
三岛由纪夫的《天人五衰》	305
安部公房的《砂女》	323
庄野润三的《静物》	337
井上靖的《苍狼》	364
宫崎骏的《千与千寻的神隐》	377
参考文献	393
人名索引	413
后 记	419

上篇

日本古代民族文化与文学经典形成



民族是文学的主体，是文化的创造者。文学是“文化”的一部分。日本的文化自古就同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连。日本的文学从诞生起就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日本人的思想和感受性。这是因为一方面日本人在各个时代的文学作品中，缺乏抽象的思辨哲学思想的表现，相对于理性思维而言，更趋于感性认识。另一方面在日本人的感觉世界里，更擅长于捕捉眼前所能触及的自然风景中的雪、月、花和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人物。日本文化在民族形成的摇篮时代起就没有形成独创性的语言秩序和抽象、完整的哲学体系。用加藤周一的话来说：“日本文化不可争辩的倾向一直以来都是切合具体的、非体系的、感性的人生特殊场面来使用语言的，而非建设抽象的、体系的、理性的语言秩序。”^①

究其原因，在于日本文化的形成是依靠中国文化长久影响、长期浸润点滴完成的。据日本考古学发现，在属于周代文化系统的铜铎和代表汉代文化的镜鉴这两种中国文化最初传到日本岛国时，过着部落生活的日本民族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统一国家。距今公元一万年前至公元前3世纪以后的绳纹时代，日本社会处于母系阶段，来自周边地区的绳纹人在不断的演变中基本上形成单一性的民族，过着以聚落为中心的采集生活。在绳纹晚期，来自亚洲的大陆移民带着大陆的新文化要素——水稻的耕种和金属工具的使用——集聚在日本生息。至3世纪弥生时代，他们将大陆水稻的农耕技术和铁器工具的冶炼技术传遍岛国，并和当地的原住民不断混血，直至邪马台国时代的4世纪末叶，形成了统一的“大和民族”。同时，日本也出现了统一列岛的大和朝廷。日本真正成为制度完备、统一的大和国家，应是在公元7世纪以后。据《隋书·倭国传》记载，600年推古朝首次派遣隋

① [日]加藤周一：《日本文学史序说》上卷，筑摩学艺文库1999年版，第11页。



唐使。又据《日本书纪》记载，607年圣德太子派遣小野妹子使随^①。从这一时期起，中日之间的交往十分频繁。日本是在推古天皇和圣德太子多次派“遣隋使”后又派“遣唐使”和大量的留学生、留学僧到中国大陆全面地学习并吸取先进的中国文化和汉字，特别是盛唐时期的大陆文化源源不断被传入到日本，推动了“大化革新”（645）之后，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才不断觉醒和自觉。根据701年日本的《续日本纪》和中国的《旧唐书·日本传》中所记载，在同中国大陆的交往中，日本国使从唐朝的角度认为“日出之处”——自称国名为“日本”，模仿唐高宗改称皇帝为天皇的做法，采用中国语称国王为“天皇”^②。在唐风的熏陶下，日本开始仿照唐朝的“律令”制定日本的“律令”，不断推进各项有效的改革举措，兼收并蓄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政治制度、儒家经典、法·儒·墨及佛教等思想和文化的精髓，把自身文明推向了成熟。可见，中国文化滋养了日本原始文化的根须，催生了日本文化的成长，使日本文化从形成起就具有双重（或多重）的结构特点。

文化的双重性（或多重性）必然给日本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也带来了双重性（或多样性）。在古代，中国的汉字没有传入日本之前，日本民族只有自己的语言却没有自己的文字。在中国大陆文化长期的熏染和教化下，在公元5世纪中叶以后，日本民族才开始使用中国的汉字记事。在此基础上，借用中国的汉字作为表音符号来书写日语，如：日语的“さくら”（樱花），就用汉字“散久良”来书写。同时，并借用汉字的意来标记日语的声。从此，日本告别了没有文字的时代。在太安万侣编写《古事记》^③（712）时，借用汉字，音义并用。后来为了更能准确地表达日本语的口语，符合当时日语口语的语法，就舍掉了汉字的字义，仅把它作为音标文字来使用。例如日本最早的诗集、8世纪末编辑完成的《万叶集》，其原文全部都是借用汉字拼成日

① 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编著：《日本历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页。

② 转引自李均祥：《日本文学的发生和起点——日本文学史研究序说》，《外国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第94页。

③ 《古事记》：全书分上、中、下三卷，记载着日本古代神话、传说和歌谣，是日本现存最古老的史书。